

# 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綜述

殷小平\*

廈門大學

2007年7月26日上午，中國內地「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在北京清華大學開幕，來自內地和香港八十多所高校的二百餘位教師和研究生參加了本屆講習班。講習班為期六日，由中國文化論壇和清華大學聯合舉辦。

## 一、講習班的緣起與旨趣

2005年6月，中國文化論壇與清華大學、汕頭大學在北京香山聯合召開了為期三日的「首屆中國文化論壇：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該論壇對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狀況進行了廣泛討論。與會代表普遍認為，內地高校的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應該著重建設「核心課程」，特別是「中外經典文本研讀」核心課程。基於以上共識，中國文化論壇與清華大學決定合辦「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旨在通過實踐「名師講授、經典研讀、助教導修、深度學習」的教學模式，促進通識教育教師在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上的提升和改善，推動大學通識教育向深度發展。

---

\*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候選人、第四軍醫大學醫學教育教研室講師。

## 二、講習班的形式與內容

本屆講習班安排緊湊，內容豐富，開學第一日上午我們聆聽了由前教育部部長周遠清教授、清華大學胡顯章教授、徐葆耕教授等前輩所作的專題演講。在上課階段，白天的課程共六講，每講六學時，分別由彭林教授、甘陽教授、李學勤教授、汪暉教授、劉小楓教授擔綱。其中彭林教授以示範教學為主，其餘各位教授以導讀、講解經典為主，晚上則輔以各講的小班討論，在沒有安排小班討論的時段，還穿插了幾次座談會。講習班主辦單位要求學員必須全程上課，不可缺席，並儘量參加晚間的小班討論和座談會。據筆者觀察，雖然酷暑難擋，但學員們仍堅持上課，熱情不減。

### （一）專題演講

開班第一日，講習班組委會為學員們安排了三場別具意義的專題演講，這三場演講的主講人都是推動文化素質教育不遺餘力，且有資深經驗的前輩。他們分別對內地大學開展文化素質教育作了回顧和總結，並展望未來發展。

教育部前副部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周遠清教授為學員作了「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特色的教育理念」的講演。作為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倡導者和重要推動者，他首先回顧了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發展歷程。他說，十多年前，文化素質教育剛開始提出的時候議論紛紛，不乏反對和質疑之聲；歷史和實踐表明，作為高等學校素質教育的切入點和突破口的文化素質教育切中時弊、順乎潮流，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理念。在展望文化素質教育的未來時，他指出文化素質教育要實現從「三提高」（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大學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的文化品位）到「三結合」（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結合、文化素質

教育與教師文化素養的提高相結合、文化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的跨越。

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清華大學文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胡顯章教授作了「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與課程建設」的講演。他從重溫費孝通先生「文化自覺」觀念切入，指出提升大學生的文化自覺、自尊與自信，引導他們進行科學的文化選擇，是通識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課題。接著，他分析了「通識教育」與「文化素質教育」的異同。他認為，從本質看，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是相通的，其共性是主要的，只是文化素質教育是基於中國現實與傳統，以及共同教育規律的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實踐創新。隨後，他介紹了清華大學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歷史脈絡：

1. 1987年，文化素質教育課程以指定性選修課方式進入清華大學的課程體系，此後，多次進行了學分要求和課程體系的充實和調整。
2. 在2000-2001年第21次教育工作討論會期間，通識教育受到學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在理念與實踐上對加強通識教育達成共識，形成了「在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的培養模式。2002年形成由十大課程群構成的文化素質課程體系，為通識基礎上的專業教育模式奠定了初步的教學基礎。
3. 進一步落實文化素質教育在人才培養中的基礎地位，提升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水平和質量，清華大學於2006年秋開始實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方案。最後，他提出了今後建設的基本思路：重點建設文化素質教育「共同核心課程」，在課程體系、師資配備、授課內容和授課方法上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加速改變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存在的粗放經營、湊足學分的現象，走核心化、精緻化和規範化之路。

清華大學原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作了「講授西方文學通識課25年」的講演。1979年，清華大學開始建立文史教研組，1980年設立

以文史哲為主的人文選修課。徐教授回憶說，剛開始，文史哲的老師普遍認為給理工科的大學生上人文選修課很沒有檔次，但由於當時文史哲等人文學系都不招收本科生，為了完成教學工作量，不得不給理工科學生上選修課。自1981年起，徐教授開始為理工科學生開設「西方文學」課。在開課之初，發生了一件令他至今仍記憶猶新的事：理工科學生為了選課，把中文系辦公室的兩扇玻璃門都擠破了。從這件事中，徐教授感受到，青年永遠是青年，富有理想、樂於思考，有著對人文知識的渴求。儘管青年學生有人文方面的強烈需求，但當時清華大學通識課程總體水平相當低，存在著一個錯位：教師講的不是學生想聽的，學生想聽的教師沒講。這樣往往導致學生「翹課」多，聽課不專心，教師靠課堂點名來要求學生，教師責備學生不用心，學生也覺得窩火。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徐教授在「西方文學」課的講授中，形成以下理念和做法：1. 把「認識你自己」作為通識教育的核心。2. 引導學生閱讀西方文學經典原著，讓學生取得與教師平等的發言權，而不是讓教師唱獨腳戲。3. 讓學生保衛自己的感受力，反對套話、假話和浮漂話。在此過程中，徐教授的西方文學課逐漸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和好評，並成為清華大學恢復文科後最早的一門通識精品課，曾獲1994年北京市教學成果一等獎。他總結說，一個好的通識課教師不比專業課教師的待遇差，最好的鼓勵來自學生。最後，徐教授飽含深情地說，令他欣慰的是能得到學生的認可，這是支撐他教學的根本力量。

## （二）教學示範

此次講習班擔綱的六位教授中，彭林教授主要以教學示範的形式，生動地向學員們介紹他如何講授「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課」，以及為甚麼要開設「中國古代禮儀文明課」。

針對大學生群體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自戕現象，從1999年開始，彭教授嘗試開設全校公選課「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他期望這門課程

能在培養大學生的文化自尊、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覺等方面有所助益。這門課程的設計思路是：以足以刷新人們對文化中國的看法的典型文物為切入點，按照專題來組織出土資料與文獻資料，展示學術界對文物的研究過程，內容要精彩，要體現學術縱深和多學科交叉的大勢。經過幾年的試驗和改進，彭教授講授的這門課程成效顯著，受到大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出現過有的大學生連續選四年都選不上的火爆場面。這門課程被評為2003年度國家級精品課程，並獲2004年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

「中國古代禮儀文明」是彭教授在清華大學開設的第二門公選課。從讀研究生到現在的二十多年，彭教授一直潛心研究古代禮學經典，這是一門很少有人問津、甚至略感受壓抑的冷學問。但正是這門冷學問讓彭教授從中窺見了禮樂文化的真諦和精妙。他認為，禮是文明民族的標誌，是人區別禽獸的標誌，是符合道德理性的行為規範，是對人性的合理約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然而，彭教授每每驚嘆：百年來人們對禮樂文化的曲解和誤解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文化上的殖民摧毀了中國人的精神防綫！他深深感到，不粉碎文化上的自我殖民，中華傳統文化就不能真正抬起頭、挺起胸；要為中華傳統文化正名，一定要從禮樂文化的歷史價值談起。這就是彭教授開設「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的背景和緣起。他說，這門課程的目的既在於使大學生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成為典雅君子，又在於引導大學生善待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走出文化上自我殖民的泥潭，樹立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 （三）經典導讀與小班討論

經典導讀和小班討論是這次講習班的「重頭戲」。講習班的首場經典導讀課由著名西方政治哲學和西方思想史專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講授，他亦是此次講習班的策劃者。他導讀的

文本是由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約前496–前406）創作的《僭主奧狄浦斯》（*Oedipus Tyrannus*）。在導讀中，甘陽首先介紹了《僭主奧狄浦斯》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揭示的主題。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臘著名劇作家、古希臘悲劇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埃斯庫羅斯（Aeschylus）、歐里庇得斯（Euripides）並稱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甘陽認為，《僭主奧狄浦斯》既是一個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文本，又是一個特別現代的文本。他認為，這個文本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認識你自己」的注釋，通過人間最有智慧的奧狄浦斯對人的認識，反映的是西方對人的追問與反思，揭示了如下的主題：人對外界的認識增加了，但人對自己的認識卻舉步不前，即相信自己的知識和自己力量的人如何遭到了存在意義上的失敗；對知識（智慧）的信仰（人是萬物的尺度）與對神的信仰（神是萬物的主宰）之間的衝突，也即人與命運的衝突。接著，甘陽對文本的結構、情節、佈局和表現手法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僭主奧狄浦斯》有很高的藝術成就，特別是在情節的整一、結構的嚴密、佈局的巧妙等方面，堪稱希臘悲劇的典範。該劇在結構上首創倒敘式的範例，劇情從故事將近結尾處展開，在向高潮推進的同時向前回溯，佈局謹嚴，結構緊湊，情節起伏跌宕，發現、反轉（reverse）、懸念等技巧運用得恰到好處。除了對文本的分析外，甘陽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意識，即閱讀西方經典，既不是出於西方崇拜（時髦的西方中心主義），也不是出於廉價的反西方中心主義，<sup>1</sup>而是要端正心態，首先確立自我，然後以一個健康人的心態和健康人的頭腦去閱讀西方。

講習班的第二講是由著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導讀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李教授說，內地高校中講《史記》的極為少見，估計這是首次。他首先簡要介紹了司馬

1 「廉價的反西方主義行爲」的一個主要特徵是，以西方話語邏輯為思考前提，拼命論證中國也有史詩、悲劇、邏輯、哲學和上帝等。



遷和《史記》。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公元前86?），字子長，西漢武帝時期人。《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長達三千年間的歷史。全書共130篇，包括本紀12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年表10篇、書8篇，共52萬字。李教授說，《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李教授特別提到，今本《史記》的130篇，非司馬遷一人所作，其中「褚先生曰」部分是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在對基本情況有所介紹後，李教授接著引導學員進入《史記·五帝本紀》的文本閱讀。李教授介紹說，《五帝本紀》是正史第一部的第一篇，又是《史記》12篇本紀的首篇，涉及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五帝本紀》記載的是遠古傳說中相繼為帝的五位部落首領——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的事跡，同時也記錄了當時部落之間頻繁的戰爭，部落聯盟首領實行禪讓，遠古初民戰猛獸、治洪水、開良田、種嘉谷、觀測天文、推算曆法和譜製音樂舞蹈等多方面的情況。這些雖為傳說，但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地下文物的發掘來看，有些記載亦屬言之有徵，它為我們瞭解和研究遠古社會，提供了某些綫索或信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就是從這遠古的傳說開始的，黃帝和炎帝兩個部落的聯合、戰爭，最後融為一體，在黃河流域定居繁衍，從而構成了華夏族的主幹，創造了我國遠古時代的燦爛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的開端。

在授課中，曾擔任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的李學勤教授還穿插介紹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性質、內容、目的和進展，並且對史學界

盛行的「疑古思潮」的歷史脈絡也進行了梳理。在導讀結束後的自由提問時間裏，李教授談到了他對大學通識教育的看法。他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功利化是現在教育的最大問題。今天的大學生不應把知識與利益祈求相掛鉤，任何科學工作，如果一旦從個人利益出發，就一定搞不好。

講習班的第三講是由著名魯迅研究專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先後導讀魯迅的〈破惡聲論〉和〈吶喊自序〉。〈破惡聲論〉是魯迅早期的少數幾篇古文論文之一，於1908年末發表在留日河南籍學生創辦的傾向革命派的刊物《河南》上，是未完成稿。汪暉說，從文本的形式上來看，文本受文學和哲學上的浪漫主義思潮影響，是在反滿革命的背景下創作的一種特殊的民族主義文本；從文本的內容上來看，這篇論文很少被人研究，但它不僅具有史料價值，也有現實意義。汪暉認為，該文本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自然段為第一部分，是序論，指出當時的中國是「寂寞之境」、「擾攘之世」和「人界之荒涼」。第二自然段是第二部分，是總綱領，提出批判的對象。批判的第一個對象為「國民」，其特徵為「破迷信」、「崇侵略」和「盡義務」；批判的第二個對象為「世界人」，其特徵為「同文字」、「尚齊一」和「棄祖國」。第三、第四自然段為第三部分，是分論，批判國民主義，認為只有發「心聲」而顯「內曜」，通過自主自覺之心，才能打破偽士造成的寂寞中國。分論中對世界主義批判的部分未能寫完。汪暉說，魯迅當時要破兩種「惡聲」，一種說法是，現在要成為「世界人」，以現在的話而言，都全球化了，還談甚麼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東西？另一種說法是，現在要成為「國民」，因為現在這個時代正是民族主義的時代。魯迅說這兩者都是「惡聲」，因為這些說法中沒有人的自覺、沒有人自身的獨特性，無非是鸚鵡學舌而已。他說這是「萬喙同鳴」，用他晚年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無聲的中國」。「無聲」不是沒



有聲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說差不多的、自以為絕對正確的話。這篇文章中有一個特別好的命題，叫做「偽士當去，迷信可存」，魯迅說這是當務之急。「偽士」就是那些每天抱著自以為進步或先進觀念的人，辦洋務、搞改良、談民主、論立憲、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來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義潮流中他成了「國民」。這些人是發不出自己聲音的「偽士」。魯迅為甚麼又說「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會迷，這裏有一種對「真實感」的追求。沒有這種真實感，一切都是虛無的。魯迅批評名教，反對傳統，但他竟然對「迷信」有這樣的理解，他對「鬼」的世界有著隱秘的迷戀。汪暉最後總結說，魯迅始終在時代的氛圍裏追蹤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但他永遠有一個「悖論式」的態度：既尋求現代化，同時反對現代化，既是啟蒙主義者，同時又是反啟蒙的啟蒙主義者，依然對眼前黑暗中國寄託著美好的理想。

汪暉導讀的第二個文本是〈吶喊自序〉。〈自序〉寫於1922年12月3日，冠於《吶喊》卷首，又曾單獨發表於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報·文學旬刊》。在文本導讀中，汪暉從魯迅創作《吶喊》的緣由入手，分析了魯迅的思想發展過程，即從年輕時的夢到悲哀的寂寞，繼而是奮起的吶喊。汪暉認為，〈自序〉中提到魯迅的兩個「夢」很關鍵，一個夢是到仙台學醫，「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另一個夢是在東京治文藝，「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這兩個夢都幻滅了，使得魯迅感到「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的寂寞，「於是用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汪暉認為，對絕望的絕望，即反抗的絕望是魯迅文學的根本動力，魯迅在感到戰鬥者的寂寞與己相通後，便「有時候

不免吶喊幾聲」，一則為了喚醒精神麻木、「熟睡」的人們起來毀壞「鐵屋」，二則「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除了對文本進行導讀外，汪暉還談到對大學通識教育的看法。他認為，有沒有請最好的教師教課是最關鍵的問題，要開出好的通識課程，老師們首先要有一定的學術積累和經由時間磨練。

講習班的最後一講是由著名學者、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劉小楓導讀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敵基督者》（*Der Antichrist*）。劉小楓一開始便向學員們作了一連串的發問：尼采的文本有很多，講習班的設計者選《敵基督者》作為講習班的示範文本，其目的和意義是甚麼？怎樣選擇核心課程的基本讀本？如何講授一個文本？他首先強調閱讀尼采作品的困難性和危險性。與進入其他古典作品一樣，進入尼采的文本是有一定難度的，而且尼采首先是古典語文學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有用典（如《敵基督者》就是用典），因此不熟悉西方古典著作，就很難理解尼采；此外，尼采的作品還具有很多古典作品所沒有的危險性，弄得不好就會害了讀者。因此，該不該給本科生講尼采，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接著，他提到了進入一個文本的基本方法。他說，在進入一個文本之前，首先要找準這個文本的位置，一是這個文本在這位作家一生寫作過程中所處的位置，二是這位作家在整個文化史、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所處的位置。把這兩個定位搞清楚，才能基本把握文本的框架。《敵基督者》可以說是尼采最後的作品。劉小楓認為，尼采寫作《敵基督者》的意圖是「以最為冷酷的理性批判來對西方迄今為止的哲學的因與果發起一次總攻」，是清算西方哲學的一個環節，目的在於重新擺正哲學與宗教的關係。那麼，在這個框架下，敵基督與清算西方哲學有甚麼關係？「敵基督者」指的是甚麼呢？劉小楓認為，敵基督者就是反對基督、抵擋基督的人，既指阻止基督的來臨，又指對自己敵人的稱呼，還指

尼采自己敵基督，尼采認為敵基督的真正名字是狄奧倪索斯。劉小楓認為，「我與你們」，「真理與謊言」是理解《敵基督者》文本的關鍵詞。在引導學員細讀以上章節的時候，他指出，尼采並不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宗教，反對基督教。他說，在尼采看來，基督教也並非徹底的那麼不神聖，要看是哪一種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沾染了羅馬帝國的神氣，還不那麼頹廢。自從德意志產生出新教，基督教就變成了「平庸的北方人」，其「頹廢形式」才暴露出來。尼采對天主教有好感得多，就因它比新教「神聖」得多：「新教是精神不純和無聊的頹廢形式。迄今為止，基督教就是以這種形式在平庸的北國摸熟了因循守舊之法」。尼采仇視人民群眾？無稽之談！尼采仇恨過會講「神聖的謊言」的教士嗎？沒有！教士牧養人民，給人民帶來此世的安慰。尼采甚至對他仇視的新教創始人路德也讚不絕口，充滿熱愛地呼喊：「路德，你在哪裏？」尼采仇視的「教士們」究竟是誰？說出來也許有點可怕——甚至乎危險——就是我們知識分子！他說，在尼采看來，啟蒙哲人「以美德狂熱」解除了「假象的世界」，真實的生活反而不復存在了，在啟蒙的世界中，揭露啟蒙哲人的謊言成了真哲人的義務。本來，「哲學不是為人民準備的」，如今哲學充當人民的代言人發出「廢銅爛鐵」的聲音：「哲人已經成了集體的害蟲。他消滅幸福、美德、文化，最後輪到他自己」。哲學不再是禁欲般的沉思生活，而是一種工匠式的手藝。他說，尼采最關心的是哲人在現代處境中的位置。只有哲人才有資格當社會的道德立法者，因為只有哲人沉思甚麼是美德、甚麼是美好（幸福）的生活、應該過的生活。啟蒙之後，「存在秩序」發生了根本變動，哲人已經不思「何為高貴」，而是為國家、民族、人民出謀劃策，紛紛跑去引導人民起來爭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分是過沉思生活。劉小楓長期以來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如何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中保養高貴精神，如何將自己的精神超拔出來，做一個有文

化教養的、有秩序感的、能抵禦現代性浪潮衝擊的精神貴族。在談到通識教育時，他還特別強調說，實施通識教育的人應該是少數真正的哲人，否則就會把通識教育引入歧途；從人的三種不同靈魂結構（哲人、統治者、多數人）來看，通識教育應該是少數人的教育而不是多數人的教育。

配合經典細讀，講習班組委會還從學員中選拔出若干年輕博士擔任助教，組織學員開展小班討論。小班討論緊扣上述經典文本和各位主講教師預留的問題展開，每個小班不超過20人，每人都要求做10分鐘左右的發言。

#### （四）座談會

座談會在晚間穿插進行，分別圍繞「通識教育與小班討論制」、「中國文化通識教育課」、「大學魯迅課與中國現代文學課」等主題展開，座談會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和思考。

「通識教育與小班討論制」邀請曾擔任過助教的學員總結他們的經驗和感受，發言的學員介紹了小班討論的組織形式和方法，以及小班討論在學生學習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並就如何發揮好小班討論引言人的角色暢所欲言；「中國文化通識教育課」座談會請學員們介紹自己開設文化通識課或其所在學校所開展的文化通識課的經驗，並交流解決困難之道。「大學魯迅課與中國現代文學課」座談會特邀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作了「講授大學魯迅課二十年」的講演。錢教授總結了他開始開設「我之魯迅觀」課程的歷程，指出其宗旨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其意義在於：1. 與青年學生對話。錢教授先後與1960、197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大學生進行了對話，三代學生「我之魯迅觀」的作業構成了當代青年思想成長史。2. 回應現實問題的方式。他認為，魯迅先生是一位思想超前的現在進行式的作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能為學生提供思想

啟蒙的資源。3. 自我生命成長的軌迹。他回憶說，他本人生命中遭受到的思想危機、精神危機和學術危機都是在閱讀魯迅、與魯迅心靈相遇的過程中得以解救和升華，而這些也成為開設魯迅課的重要資源。在做溝通學生和魯迅之間的橋樑的過程中，錢教授的體會是：1. 堅定對魯迅的信任。他認為，魯迅有自己的力量，不贊成保衛魯迅的提法，而是鼓勵、引導學生讀魯迅原著。2. 正確認識和把握青年以及青年與魯迅的關係。他認為，只要具備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正在思考問題的學生，都能理解魯迅，他的任務是引導學生與魯迅建立心靈的契合點。3. 正確把握自己、課程與學生的關係。他認為，教師不要把自己當成「教師爺」，師生應完全平等，教師要敢於講出自己的困惑，敢於承認暫時回答不了的問題，鼓勵學生提出不同問題，引導學生一起來探討。錢教授說，他樂於與學生交流，願意把心靈向學生敞開，在備課過程中將困惑拿出來與學生交流。與會學員從錢教授幾十年的教學經驗總結中深受啟發，在錢教授的演講後，幾位在大學講授文學課的老師也分別發言，交流自己開課的體會。

總體而言，座談會成功地發動學員們參與到討論中，大家討論的問題由文化素質課內容和形式的問題，到組織管理問題，涉及的方面極為廣泛，這說明大家非常關心文化素質課的開展，尤其是實踐層面上的可行性、以及完善和發展等問題，都曾引起大家的深入討論。座談會的討論意猶未盡，其所營造的討論氛圍，以及激發學員們思考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 三、講習班的效果與反思

在7月31日下午的閉幕式上，講習班組委會的兩位執行主席甘陽和胡顯章分別進行了總結。兩位教授都高度肯定了學員們的參與意識和學習熱情。甘陽說，學員們的投入精神令人感動，給他以希望。他呼

籲道，每個大學只要有幾位好教師，開好幾門通識課，大學通識教育就有希望。胡顯章勉勵大家說，每位學員都要努力成為一顆通識教育的「火種」，將「火種」播撒到各自的學校去，讓星星之火燎原。

近十位學員代表暢談了參加講習班的感受和體會。學員們的普遍共識是：（一）講習班立意高遠。不僅在經驗技術層面上為年輕教師示範了如何開設經典細讀核心課和如何組織小班討論，還在思想觀念層面上催生了年輕教師的文化自覺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二）講習班質量上乘。不僅教學內容設計合理，而且邀請到了一批名家大師授課。

（三）講習班的效果明顯。不僅促進了不同高校通識教育做法的交流，而且增強了開展通識教育的信心，增進了對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理解，初步掌握了如何開設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方法。其中，一位學員代表引用布魯姆（Allan Bloom, 1930–1992）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話語來表達他的感受。他說，在看到講習班的通知時，他就有一種感覺：「我發現了自己的生活」，因為講習班顯然是為了某個更為崇高的目的的存在，而不是出於功利需要。他說，講習班給他指向一條路，「這條路通向偉人會面的地方」。<sup>2</sup>在那裏你可以見到平時很少見的一類人，沒有他們，你既不能認識自己的能力，也不會明白作為他們中的一分子是多麼美好。他說，講習班提供了在較高的水準上進行討論的模式，營造了自由探索的空氣，並讓大家分享討論中產生的友誼；更重要的是，這裏有傑出的思想者，他們是理論生活存在的活的證明。這些思想家們努力復興對於這些重大選擇物（經典文本）的思考、展示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時的重要性和危險性；經典文本被給予了顯著的強調，從而與現代生活中的那些瑣碎平庸的思考形成鮮明的對照，前者常常提出一

2 布魯姆著，繆青、宋麗娜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63。



些難以弄清的深刻問題，使得人的靈魂面臨高度緊張和衝突。所有這些思考與選擇就是心智的或者說「價值」的選擇，是「一個最沉溺於實際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達的敬意」。<sup>3</sup>

學員們還紛紛建議中國文化論壇每年選取與一所有代表性的大學合作，把講習班堅持辦下去，培訓更多更好的通識教育師資，進而把大學通識教育推向深入，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和中華文化的復興貢獻力量。

講習班不僅給學員們帶來了巨大收穫，而且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困惑。學員們的困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識教育是面向少數人的精英教育，還是面向多數人的大眾教育？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看來，自由教育永遠不是普遍的教育，它只能是少數人的義務和權利，其性質是精英教育。不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哲人堅持自由教育的精英性，現代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布魯姆等也贊同自由教育的精英性。因為在他們看來，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毒劑，它們針對的是大眾文化的腐蝕性影響，及其固有的只生產「沒有精神或遠見的專家和沒有心肝的縱欲者」之傾向。自由教育是努力使大眾民主提升為原初意義上的探索美好生活和追問德性生活的貴族制民主所憑藉的階梯。<sup>4</sup>在施特勞斯看來，「我們一定不能期望自由教育會成為普遍教育，它將總是一小部分人的義務和特權」，<sup>5</sup>「不能變成、且不會渴望變成大眾運動」。<sup>6</sup>可是，自1945年哈佛大學《民主社會中的通識教育》發表後，通識教育變成民主社會中的一種普遍教育。那麼，通識教育的目的是否會實現？面向

3 同上注，頁359。

4 施特勞斯著，一行譯：〈甚麼是自由教育〉，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頁5。

5 施特勞斯著，肖潤譯：〈自由教育與責任〉，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頁24。

6 吉爾丁著，魏朝勇譯：〈教養教育與自由民主制的危機〉，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頁36。

大眾的通識教育是否會陳義過高或過於理想化？通識教育的品質如何保證？放到中國的情境下，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當下，通識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在哪類型高校更為可行？它的品質如何保證？這些都是講習班上碰到的問題。

（二）通識課程的最佳模式是經典閱讀嗎？對此持肯定觀點的似乎很有說服力。例如，施特勞斯就認為，「自由教育幾乎等同於閱讀古希臘經典」，<sup>7</sup>自由教育「沒有比閱讀古代經典更好的開始了」。<sup>8</sup>布魯姆認為，自我實現有賴於對人的可能性的認識，而這些可能性就有血有肉地活在那些舊書之中，這些舊書「提供了一種教育資源，並能提供關涉人類德行和對高貴生活的熱切渴望所必不可少的教訓」。<sup>9</sup>他說，大學生最需要的是訓練閱讀一些位於偉大傳統中的著作，這個傳統可以給他們嚴肅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這類書「即使讀的數量少些，也比匆匆忙忙讀了一百本書好」。<sup>10</sup>但這種具有說服力的觀點是否是最現實的、最可行的觀點？至少與布魯姆相比，我們缺少對經典的真正熱愛，也缺少親炙偉大作品的渴望。對一本偉大著作或一個偉大作者的反覆閱讀與信賴已然消失，這不僅導致生活基調的庸俗化，而且也導致社會的原子化。況且，僅僅擁有偉大的作品是不夠的，「必須恰當地閱讀和解釋那些作品」。<sup>11</sup>對於內地大學通識教育教師而言，我們是否具備「恰當地閱讀和解釋那些作品」的能力？從講習班上幾位老師導讀的中西方經典文本的情況來看，離開了李學勤老師的導讀，有多少學員能恰當地閱讀和理解《史記·五帝本紀》呢？離開了劉小楓老師的導讀，又有多少學員能恰當地閱讀和理解尼采的

7 施特勞斯著，肖潤譯：〈自由教育與責任〉，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頁23。

8 同上注，頁24。

9 布魯姆著，秦露、林國榮、嚴蓓雯等譯：《巨人與侏儒》（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頁111。

10 同上注，頁324。

11 同上注，頁111。

《敵基督者》呢？這可從小班討論的情況進一步看出，相當比例的學員難以真正讀懂這些中西方經典。這些學員大多來自內地重點高校的大學教師，大多具有博士學位或為博士候選人。他們之所以難以讀懂經典，大概與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通識教育和經典閱讀訓練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否可以說，經典閱讀可能是最佳的通識課程模式，但未必是最可行的通識課程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概論課、導論課和講座課恐怕還得延續。這可能是許多高校基於現實的無奈選擇。

（三）作為個體的大學教師在通識教育中有何作為？學員中大致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受功利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大學內外部評價機制的制約，大學教師在通識教育中很難有所作為，只有改革教育體制和教師評價機制，本科教學和通識教育受到高度重視後，教師才能發揮作用。另一種觀點認為，儘管當下不利於通識教育的內外部因素很多，但大學教師還是可以從自身做起，可以在小範圍內改善教育品質，實施通識教育。他們認為，這次授課的甘陽教授、徐葆耕教授、彭林教授和錢理群教授等就為大家樹立了從個體出發上好通識課的榜樣。這部分學員認為，改革開始的時候比較難，看不到出路，但只要找準方向堅持下去，就會收到效果，逐漸營造出一種有利於通識教育的氛圍。儘管如此，持後一種觀點的學員也會面臨一種困惑：在大學沒有建立良好的通識教育氛圍和激勵機制之前，個人的通識教育熱情能堅持多久？有多少教師會堅持下去？

當然，小班討論怎麼才能真正收到實效，而非流於形式？師資建設在通識教育中處於何種地位？如此等等，都是學員們存在的問題和困惑。古人云：「學貴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不疑則不進。」從這個意義上講，給學員留下困惑和疑問的講習班不僅不是它的缺點，相反還可能是學員們的另外一種收穫吧。

## 參考書目

1. 布魯姆著，秦露、林國榮、嚴蓓雯等譯，《巨人與侏儒》，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2. 布魯姆著，繆青、宋麗娜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3. 吉爾丁著，魏朝勇譯，〈教養教育與自由民主制的危機〉，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頁25-37。
4. 施特勞斯著，一行譯，〈甚麼是自由教育〉，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頁2-8。
5. 施特勞斯著，肖潤譯，〈自由教育與責任〉，收入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頁9-24。